



船山书院是一所为祭祀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而设立的书院。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衡阳人，早年曾多次参与抗清斗争，晚年隐居于衡阳的石船山下著书立说，世称“船山先生”，其学说博涉经学、史学、哲学、天文、地理、文学等，体大而思精，备受后人推崇。

清光绪初年，在时任湖南督学朱道然的倡议下，多位衡阳士绅集体捐资于衡阳南城外兴办了“船山书院”，这也是我国历史上首个以“船山”命名的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年），祖籍衡阳的兵部尚书彭玉麟虑及船山书院面积狭小、环境嘈杂，“殊不足以安弦诵”，将书院迁到了环境清幽、风光秀丽的东洲岛，即如今的船山书院所在地。船山书院是清末民初船山思想的研究与传播中心、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学风浓郁、人才辈出，在清末书院当中独领风骚。

潜心笃志 弘扬船山遗韵

船山书院因船山先生而建，依船山思想而存，它凝聚了衡阳士绅追慕乡贤的拳拳之心，也契合了文人学子探究船山学说的迫切需求。早在创立之初，船山书院就确立了“讲明夫之学”的办学宗旨，聘请“学问名望素优之士”到院中讲学，但受地域、生源等条件限制，彼时书院声名未显。光绪十七年（1891年），船山书院迎来了新任山长王闿运，这位当世名儒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船山书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掀开了船山思想研究的新篇章。

王闿运早年便阅读过船山著作，对船山先生极为尊崇，在执掌船山书院期间，王闿运更是秉承书院办学宗旨，身体力行弘扬船山遗韵。每逢船山先生祭祀日，他都要亲自带领书院师生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并且在仪式上讲述船山先生生平事迹，称颂船山先生崇高气节，告诫广大师生谨记先生之教。此外，王闿运对船山著作也有着深



入研究，其著作《湘绮楼日记》当中保存了大量的研究札记和心得。在王闿运的推动之下，船山书院很快成为了清末研究传播船山思想的核心机构，形成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培养出了谢彬、周逸等多位在船山学说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除了研习船山学说之外，船山书院还对船山著作进行了整理刊刻。光绪十三年（1887年），船山书院曾将两江总督曾国荃捐赠的《船山遗书》板片进行了修补翻刻，同时新增刻本6种。光绪十九年（1893年），船山书院再次投入巨资将《船山遗书》重刊，为船山著作的保存和船山学说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而经过船山书院多年不懈的努力，船山学说的社会影响力也得以迅速提升，最终成为湖湘文化史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不拘一格 造就栋梁之材

船山书院是船山思想研究史上一颗璀璨明珠，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末年，传统书院逐渐由私学改为官办，教学方式也从曾经的自由讲学转向了科举应试教育。而作为清末书院之首的船山书院，不重科举之学，以研习船山思想为务，走出了

一条相对独立的办学道路。

在办学过程中，船山书院承袭了船山先生不拘一格的治学精神，十分注重对学子个人能力的发掘与培养。王闿运担任山长期间，以培养当世英才为己任，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原则，吸纳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学子进入书院学习，这其中有才略过人者，有文采卓然者，亦有画技超群者，皆因其所长而循循教导之。而船山书院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也吸引了大批外地学子前来求学，一时间形成了“学在船山”的盛况。得益于“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思路，船山书院也培养出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长期活跃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之上，在政治、教育、文艺等多个领域均有着不凡的成就。比如，有革命家雷飞鹏，衡阳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蒋啸青；在教育界，有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学创办者胡元倓，曾在暨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湖南大学等任教的教育家马宗霍；在文艺界，有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书法家向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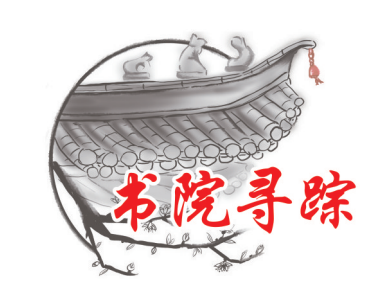
匡时济世 抒写爱国华章

清末内忧外患交加的困境中，

承继了船山先生忧国忧民爱国情怀和经世致用实践精神的船山学子亦有着强烈的匡时济世愿望，希望能用一身所学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王闿运的得意门生蒋啸青就是其中之一。

蒋啸青曾在船山书院求学5年，后考入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在教育界声誉很高。蒋啸青一直密切关注国事，在日常教学中亦注重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意识，鼓励和领导学生开展爱国运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蒋啸青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蒋啸青随即发动组织学生积极响应，采取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蒋啸青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湘南地区的革命先驱，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蒋先云、毛泽建、伍若兰等一大批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马日事变后，蒋啸青在一次作战中不幸受伤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除了蒋啸青之外，还有诸多船山学子身先士卒奋斗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着匡时济世的理想。船山学子们以“尽掷头颅不足痛”的勇气抒写了感人肺腑的爱国华章，同时也激起了衡阳乃至湖南青年奋起救国的昂扬斗志，在浓郁报国氛围的影响下，诸多湖湘儿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湖南也成为了国内早期红色革命的策源地和共产党人的摇篮。

百年时光匆匆流过，如今“东洲桃浪”犹在，船山精神长存，曾饱经沧桑的船山书院也已整修一新、生机焕发，那旧时的朗朗读书声仿佛仍回荡在湘江之上，迸发出催人奋进的力量。



（上接1版）二是制定完善海外引才政策。引才相关政策规定散见于43个部门规章和文件，涉及部门多、协调成本高。涉及配偶安置、子女教育、住房等人才引进政策已明显改善，但签证、税收、金融、社保等配套政策碎片化，社会化服务支持体系尚不健全。研究制定既符合国际惯例又有利于人才引进使用的法律法规，探索柔性引才引智方法，不断拓宽外籍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渠道，特别是社会和民间渠道。扩大人才类签证和永居证发放数量，科学合理制定外国人永居待遇，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同时，还要大力实施柔性引才，实行特殊支持政策，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设立研发机构，就地吸引使用海外人才和智力。三是帮助引进人才加快融入国内科技创新创业环境，加强与国内人才和团队的合作。四是做好特殊人才安全工作，扩大市场和社会组织引才渠道和规模，淡化政府主导引才育才观念，规避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在我国引才上制造的风险，有效处理好引进、使用、管理、服务等各方面关系。五是加快倡导建立国际人才发展合作组织，形成人才培养、使用、流动、评价等国际合作体系，形成人才纠纷多边协商机制，促进人尽其才，维护人才安全，打破少数国家垄断稀缺人才格局，遏制和扭转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套利”行为。

大力培养国家急需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和人才团队。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创新型驱动发展正向各个关键领域延伸，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需要大量战略科技人才、复合实用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解决的有效途径首先是立足自身培养，有效推进创新教育，下大力气改变应试教育模式，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创新文化，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调整高校招生比例结构，大规模缩减研究对象模糊、研究水平不高、社会需求不旺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学生招生规模，扩大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急需紧缺技能人才招生比例。以“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为载体，完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培养支持体系，赋予科技创新人才更大自主权。改进高层次人才科研经费支持资助方式，加大科研经费集成力度，尝试实行基础研究经费“不跟项目、跟人走”办法，摒弃“撒胡椒

面”式支持模式，改变项目申报、评审、论证、评价等不合时宜办法。推动中西部地区人才发展，解决长期存在的地区人才发展结构失衡问题。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西部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最大短板是人才问题。应大胆突破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政策障碍，让艰苦基层地区人才政治上受重视，社会上受尊重，经济上得实惠。重点选派教师、医生、文化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到西部服务，巩固来之不易的全面小康成果。

建立人工智能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管理新格局。过去20年来，人工智能突飞猛进，部分技术人才停滞不前，将来会是第一批被机器取代的群体。“机器”加“人”变成了人，智力水平甚至超过人。工业机器人、商用机器人和家用机器人等在各个领域大显神通，几乎可以替代目前人类所从事的绝大多数工作岗位，人的体力与智力被逐步解放出来。有研究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会被机器人替代，未来中国被替代的工作岗位将达到77%。这些岗位涉及制造、通信、保险、财务、金融、艺术等行业领域计100

余种。汽车、飞机、舰船实现了无人驾驶，展示出更加规范精细的轮廓。这些变革已经或即将到来，其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将极大地超出我们的想象。“人才”被制造开辟了人才来源新模式。过去人才基本上通过专门教育机构实现，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机构不再是人才的唯一来源，人才可以直接由企业快速“量产”，然后进入机关、学校、社会等不同岗位。有人预测，因复制成本低，将来被制造出来的“人才”将远远超过地球人口规模。必须对未来人才需求进行科学预测，防止人才短缺和人才冗余并存。一般来说，机械性的、重复性的、例行性的工作可以通过制造人才来替代；相反，创造性的、灵活性的、例外性的工作则必须由人或人操控完成。被制造的人才越多，围绕被制造人才衍生出来的工作岗位就会越多。未来是人机共存相彰时代，也是全社会面临新机遇新挑战时代，所有相关主体都必须因应时代变化，相机抉择，精准施策，推进人才强国战略高质量实施。

（作者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主流媒体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舆论引领及增强文化软实力等重大职责。媒体融合发展是提高主流媒体文化传播力和竞争力的重大举措，主流媒体应顺应数字化、移动化的信息传播趋势，积极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传播技术、内容制作、媒介功能、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提高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等方面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牢牢把握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话语权。媒体融合战略下提高主流媒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完善管理体制。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媒体融合亟须组建强有力的统筹协调管理机构，统筹推进技术、资源、机制和人才的互通融合发展，优化新闻生产流程，建立新闻和信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机制，着力打造一批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提高产品质量。媒体融合不仅仅在于运用新的信息技术，更重要的是坚持“内容为王”的核心竞争力，发挥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强大优势，靠好的作风文风，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制作具有权威性、思想性、客观性的深度报道和评论，以优质的新闻产品和严肃新闻态度引领公众的思想及价值判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要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需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和接受特点，因此新闻媒体要有自身特色，有精准的受众定位。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要积极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需求，提供专业化、分众化的信息产品。要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社交平台，促进用户之间的互动交流，扩大用户的覆盖面和规模，提高产品的实效性。

第二，注重产品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当前，新媒体传播形式发展迅速，具有极强的黏力，用户在图文并茂、视听兼备、生动形象的多维体验中受到信息内容的引导。主流媒体要善于运用图片、音频、视频、动漫、直播等新媒体传播手段制作吸引力强的作品，将好的思想、观念和内容，通过生动的形式的和多样的手段表达出来，带给受众全新体验。

第三，要把握好时度效。时度效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时，就是时机、节奏；度，就是力度、分寸；效，就是效果、实效。时效决定成效，速度赢得先机。提高产品质量，主流媒体应紧跟网络时代人们的阅读需求和阅读变化，必须认真处理好“时”“度”“效”三者的关系。比如主流媒体的报纸需更新版面设计，尽可能多地增加图文类、趣味性、可读性强的文章，对时政新闻要有迅速及时的报道。电视台应适应新媒体传播的快速性特点，可拍摄一些短视频或者互动性较强的采访报道，即时制作短小鲜活的信息产品，走进生活，走进群众。

运用新型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革新日新月异，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应用速度越来越快，5G、人工智能等已在传播领域崭露头角，推动了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主流媒体要及时跟进信息技术革新态势，掌握并运用媒体融合的技术前沿成果，提升融合发展的科技含量。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提升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能力，建立丰富的数据资源，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力度，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信息资源基础。要牢牢把握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积极与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合作，利用新媒体的成熟技术和平台，提高主流媒体在移动互联网上的覆盖面和引领力。

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目前，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市场已经扩展到广大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如何引导这些用户、如何抓



住这个新兴市场是媒体融合发展当前必须面对并处理好的问题。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必须加大媒体融合发展力度、广度和深度研究，在5G背景下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效果进行评估、定位、优化，鼓励主流媒体大胆创新、适应和运用移动传播理念，培养和挖掘移动传播人才，在媒体与产业互联网融合方向实现突破。

加强人才引进培养。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加持，新媒体已经成为一个横跨电信、传播、软件、计算机、设备制造等诸多领域的新产业。在5G背景下，新媒体呈现出从“跨行业”向“全产业”发展的趋势，对产品经理、数据处理工程师、客户服务等岗位的需求明显增加。这一变化对主流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主流媒体的人才储备和人才类型亟须调整。因此，构建科学考评体系、完善评估制度、建立存量人才提升、引进人才奖励机制是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

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主流媒体既要积极引进各类互联网技术人才，还要加强对现有采编和工作人员的能力培训和提升，更要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在体制上要完善现有人才使用管理政策，激活人才队伍活力，全力打造一支具有专业新闻素养和互联网思维、熟悉新媒体传播运营、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从新闻采编、技术研发、平台运营、经营管理等方面优化配置人才结构，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